

科学界动态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概况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集，1955年10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其他各地的语言研究工作者、语言教育工作者、文学、戏剧、电影、曲艺、广播、速记、翻译、新闻、出版工作者的代表以及应邀参加的外宾：苏联汉语专家鄂山蔭教授和郭路特教授、波兰汉语专家夏伯龍教授和赫邁萊夫斯基教授、罗马尼亚语言学家格拉烏尔院士、国务院苏联文教總顧問馬里采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苏联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和北京大学朝鮮人民共和國语言学家柳烈教授，共126人。国务院副總理陈毅和中国科学院院長郭沫若在開幕会上都作了重要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員胡乔木在閉会后也作了重要的談話。會議听取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長罗常培和副所長呂叔湘所作的關於“现代汉语规范問題”的報告。这个報告分三部分：（1）為什麼在这个時候提出現代漢語的規範問題？（2）關於現代漢語的規範化有些什麼原則性的問題需要解決？（3）怎樣進行規範化的工作？會議分組討論了这个報告和謝尔久琴柯教授的“漢語標準語規範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則”的報告。會議期間，有三天是代表們在大会上發言，發言的有32位，其中有外賓7位。

會議對於規範化的一些理論問題、它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充分加以討論並且取得了一致認識。資產階級語言學者認為語言是自然發展的，分合變遷，人們只能听其自然，不能加以任何干涉。罗常培、呂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問題”的報告中，对这种荒謬的理論予以嚴厲的批評。按照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學說，語言可以規範並且必須進

行規範，所謂規範並不是改變語言的客觀規律，而是幫助、促進語言規律的發展。格拉烏尔院士說：語言是客觀存在的，它有它自己的內部發展規律，這種規律不能絲毫加以人為的改變。在我國曾經有人企圖改變語言的客觀發展規律，但是都失敗了。可是語言學家可以研究這種客觀規律，掌握它，然後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幫助它前進，這就是規範化的工作。周祖謨認為：從語言的發展上看，語言的規範化對於語言的發展是有利的，它可以促進語言的發展，使其更趨於精密和完善，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到會代表們從日常生活上，從國家建設上，從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深切地体会到漢語規範的重要和必要。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是在目前全國政治上、經濟上空前統一的狀況下，規範明確的統一的語言更顯得特別重要。祖國正处在社會主義的建設高潮，各地區人民的交往、接觸日益頻繁，沒有統一的共同語，將要招致很大的損失。吳昌說：延邊大學醫科畢業生分配到外地工作，由於方言關係不能和病人交談，了解病況，進行診治，結果不得不要求回本地工作。廣播工作者感到方言紛歧使廣播工作發生障礙，有些地區不能用北京話廣播。丁一嵐舉出：全國55個廣播電台就有18個用方言廣播。由於語音沒有規範，常常引起誤會。話劇、電影工作者同樣感到漢語規範化的必要。孫謙指出：由於演員的方言分歧，往往劇中的一家人的語音不同，使觀眾听起來不順耳，減低了劇本的教育價值。漢語規範化對語文教學工作者感到特別迫切。馬學良指出：由於語言的隔閡，教學上常常遭致最大的損失和引起誤會。吳昌舉出延邊大學朝鮮族學習漢語的困難情況：

我們兄弟民族的兒童和青年付出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所學到的漢語語音却始終徘徊在字典音、教員音、地方音、說話音、讀書音的南腔北調之間。這種混亂的現象使學生苦惱萬分。有些人認為漢語語音沒有標準，對學習漢語失掉了信心。吳昌最後說：作為一個語言教學工作者，作為一個對少數民族教學漢語的工作者，我衷心地擁護漢語規範化工作的開展。

參加大會的代表對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原則和細節問題進行了討論。岑麒祥認為：規範化對不同部分應該不同處理。北京音內部也不是完全一致，北京音應該以知識分子的語音為標準，而不是把北京的很多土音都包括進去。蘇聯莫斯科標準音、英國倫敦標準音、法國巴黎標準音的情形都是如此，土音不收在內。很多代表都指出：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無論在語音、詞彙、語法方面都應該去掉太土的、使用範圍很小的一些成分。關於推行普通話的辦法，張仲實認為：詞彙方面可加以規定，例如：商品名詞、科學技術上的術語、電影、話劇、教科書、報紙、廣播所用的詞彙都可以由科學機關加以研究統一起來，呈請政府批准實行。倪海曙則認為硬性規定是不妥當的，一來是行不通，二來引起人心理上的恐懼，對規範化有反感。他說：在做法上他同意羅常培所長在中國語文發表的“略論漢語規範化”所說的“多影響、少規定”的提法。

語音方面，討論了兒化、輕音、聲調、一字異讀等問題。

關於兒化問題，意見有紛歧。孫謙說：兒化並不能給語言增加光彩，有些詞不加“兒”完全可以听懂，為什麼一定要加“兒”呢？黃綺主張不廢除，他說：兒化在北京話中作用很多，如能區別詞類，幫助解決很多語法問題。兒化並不是北京獨有的現象，許多方言裏都有，普遍性很大。

陸志韋發言，用分析的辦法把北京話的兒化詞分成三類。第一類甲，有“兒”無“兒”同一詞類，可是意義上大有分別。如，面＋兒、白面＋兒、加油＋兒。第一類乙，有“兒”無“兒”不同詞類，意義上是聯貫的，如蓋＋兒、清＋兒、個＋兒。第二類甲，必須有“兒”可是“兒”不起區別意義的作用，如“村兒”、“手腕兒”。第二類乙，必須有

“兒”，但是除了“兒”，詞裏已有別的成分制約着，可以區別意義，如“小雞兒”、“打鳴兒”。第三類，“兒”可有可無，意義一樣，如“魂”、“軸”、“豬肝”。然後，以分別對待的原則他認為就能區別意義一點來說，第一類有保留價值，第三類可以考慮根本不教不學，第二類情形比較複雜，尚待商討。

關於輕音問題，陸志韋認為也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同一詞類，用輕重音區別意義，如“大爺脾氣”，“二大·爺來了”；第二類，輕重音區別詞類或是語法作用，如“文章的大意”，“太太·意了”；第三類，輕音不區別意義，可是必須說，如“泥·餅”，“西·瓜”。第一類的例子能豐富詞彙。第二類那怕說錯了，語法上也不發生影響。第三類的輕音也和第二類差不多。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處理。彭鐸、薛聲震說：既以北京音為標準，則應保留其全部特點，兒化和輕重音都是北京音的重要特點，如果取消這些特點，則喪失了以北京音為標準的這個原則。

關於聲調問題，有兩個相反的看法。倪海曙說：要大家學普通話，大家都有發言權，應該注意羣眾的批准。聲調方面的要求應該寬些。我教新文字不標調，效果很好。據專家們研究，上海話有七調、八調，我生長在上海，從不覺得上海話有聲調，而意義完全可以區別（領和捨兩字例外）。北京話聲調，外地人學起來很困難。我覺得北京的聲調可以不定為標準。王力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說：廣東人學北京話，掌握聲調比輔音、元音還容易。對於學習的人，要求可以低些，但不能沒有標準。北京話的聲調應該作為標準。吳語有清濁等因素區別同音詞，聲調比較次要，北京話則不同，聲調是區別同音詞的重要成分。至於變調，規律很難掌握，學習很難，不知應如何處理。

關於一詞異讀的問題，代表們提出很多規範的具體建議。孫崇義說：一詞多讀可以這樣來解決：如果韻書上的北京音現在已經死掉了的，像“暴露”的ㄋㄣˊㄅㄨˊㄌㄨˊ一音應該捨棄而從現在的音，讀ㄋㄣˊㄅㄨˊㄌㄨˊ。劉鏡人說：北京音本身存在着問題，如語音和讀音之別，這些問題的處理，他認為：（1）要看這個字在複合詞裏的關係，如“頭尾”、“排尾”等詞中的“尾”應當讀ㄨㄟ；“尾巴”裏的“尾”可以讀ㄨ。 （2）要看這個字的發音在

複合詞裏和其他字發音上的關係，如“血液”、“血壓”等詞中的“血”讀ㄒㄩㄝˋ，在發音上比較方便，讀ㄒㄩㄝˋ不方便。(3)除這以外，應以口語作標準把異讀統一起來，如“誰”讀ㄕㄟ，不讀ㄕㄟˊ。張為綱說：“垃圾”照同根詞應讀ㄌㄞˊ而不得讀ㄌㄞˊ；“汗流浹背”的“浹”讀ㄑㄩㄢˊ；“顫動”的“顫”讀ㄑㄩㄢˊ都是和原來的讀法(ㄑㄩㄢˊ)不合的。把古代標準音和現代標準音對比一下，找出對應規律，照顧了古音，就照顧了方音，詞典注音應配合注古音。許多古音保存在方音裏，北京話的個別字音規範，須有歷史觀點，死抓住現代音，不聯系過去，是不行的。

詞彙方面的規範，會議上討論了五個問題：

(一)基礎方言內部詞彙的規範問題，(二)普通話吸收方言詞的問題，(三)吸收古代詞的問題，(四)外來語詞的規範問題，(五)創造新詞的問題。鄭奠、吳曉鈴在發言中指出：普通話一方面捨棄基礎方言中過於土的某些詞，一方面從其他方言中吸收所需要的詞，所以在詞彙問題上，普通話對它的基礎方言的關係主要在於去掉某些詞，對旁的方言的關係主要在吸收某些詞。鄂山蔭教授介紹蘇聯對方言詞彙和古語問題的处理經驗，他說：蘇聯過去有些人有些看法，認為使用方言詞彙就是用民間成分豐富文學語言，從我們工作實踐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必須大力扶持基礎方言的規範，“一個方言詞的普遍性和一個古語的運用頻率是規定我們讓不讓它在現代文學語言詞彙裏佔有合法地位的主要標準。”朱德熙說：一個方言詞已經進入書面語，取得了公民權，不妨從寬處理，因它的危害性不大。對新生的外來格式的詞就要從嚴，因為它可能引起較大的危害。關於外來語詞彙的吸收問題，有人建議兩個原則：(1)看它是不是需要，沒有這個需要或者我們自己語言中有別的詞可以表達的，就可以考慮不吸收。(2)看它是否合乎漢語的構詞規律，不合乎漢語構詞規律即使有需要也不應該吸收。關於同義詞的取舍問題，會議上有所爭論。羅常培、呂叔湘在“現代漢語規範問題”的報告中認為：現代漢語詞彙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是同義詞繁多，像“洋灰、水泥”，“暖壺、熱水瓶”，“教室、課堂”等等。這種無用的同義詞很多是“譯語”，由於來源不同，譯人不一，造成分歧和重

複，是應該統一而現在還沒有統一的。朱德熙認為：同義詞的取舍要仔細研究，例如：“留聲機”和“話匣子”有時意義並不完全相同。比如說：他是一個“話匣子”就不能說他是一個“留聲機”。吳文祺認為：同義詞要是有修辭色彩不同的，應當保留，不能認為凡是同義詞都一定取消。

語法方面的規範，根據代表們的發言和討論可以分為四個問題：(一)基礎方言內部語法規範問題，(二)方言語法的吸收問題，(三)古語法文言語法的吸收問題，(四)外來語法的吸收問題。陸宗達認為：“以北方話為基礎並不能理解成把北方話的語法原封不動無所損益的按照北方話去規範，而是相反地，一方面應當排斥北方話語法中有些不健康的部分，統一內部不一致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別的語法結構來給民族共同語輸血”。關於北方話的內部規範問題，他認為：1、像西南官話區常說的：“需不需要”，“反不反對”，“美不美麗”……在這裏“需要”、“反對”、“美麗”都是絕對不能拆開的單詞，萬一拆開，那就是破壞了詞的完整，是應當排斥的。2、虛詞的亂用，北京話“再”、“又”有分別；“呢”、“嗎”有分別，不能亂用，可是在四川話裏“再”和“又”，“呢”和“嗎”的用法就有點混亂。如：北京話說：“明天你再去吧”，四川話說：“明天你又去吧”。北京話說：“甚麼呢？”四川話說：“啥子嘛？”這些在北方話中都不許可這樣說，應該加以規範。其次，像吳語區的語氣詞“的”跟吳語“穿穿看”，“說說看”的“看”，他認為北方話可以吸收進來，豐富漢語的形態。此外他還談到應該借鏡古人和外國的語法。古語法跟外國語法已經在書面語通行很久，北方話裏又沒有適當的可以代替，應當適當地加以吸收。

在普通話和方言的關係這個問題上，代表們提出了幾種不同的看法：林蔭認為：方言同普通話之間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推廣普通話自然要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但是方言本身還是要不斷發展的，在方言發展過程中以它不斷產生的符合生活需要的新的成分豐富普通話，所以方言消滅的過程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葉籟士認為：目前的情況是方言太多，因此推廣普通話必須盡量擴大普通話的使用範圍，縮小方言勢力；方言縮小和消滅的過程不能採取行政措

施，而是用推廣、提倡的辦法來擴大普通話的影響。周有光認為：方言存在是很頑強的，能講普通話還要講方言。這幾位代表的意見反映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在推廣普通話的過程中，方言的發展和消滅的情況；一個是推廣普通話應當採取的辦法。這兩個問題在羅馬尼亞語言學家格拉烏爾院士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蘇聯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的書面報告裏都從原則上作了一些解釋。格拉烏爾院士說：“脫離一種方言，採用同一種語言的另一種方言（或者採用那民族的形式），人們通常卻只分階段，採取連續過渡的方式來進行：起初採用一個特點，其後又採用另一個特點。”謝爾久琴柯教授說：“成為民族語基礎的某一方言有時要經過一個漫長的用其他諸方言來發展和豐富自己的道路”。“方言在民族語發展的後期，一方面消失自己的獨特性，另一方面特別是在標準語的影響之下開始在民族語中被磨掉，溶合在民族語中。”關於推行普通話的方法，謝爾久琴柯教授的書面報告裏也談得很明確，他認為：“統一的標準語只是逐漸給自己開闢道路，逐漸在各階層人民當中取得威信，因此，一下子在各地停止使用方言，停止利用方言貫徹各種文化教育的以及其他具有社會政治和國民經濟意義的各項措施，那是錯誤的。應該培養居民在國家的、社會的和和其他組織內普遍應用漢族共同的現代標準語……但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同時利用方言進行工作。”

關於文學作品和戲劇電影中使用方言土語的問題，代表們反映了一些作家、演員的思想情況，有些作家、導演和演員認為文學作品和戲劇中的故事發生在某地，其中的人物就該用某地的方言，這樣才能增加藝術的表現力。這種思想經過討論，代表們一致認為是不夠正確的。楊晦認為推行普通話必須堵塞方言文學的道路。孫謙認為文學藝術的表現力並不完全靠方言、土語。蘇聯鄂山蔭教授和謝爾久琴柯教授的報告裏都引用了高爾基的話說明文學作品裏不能濫用不必要的方言、土語來堵塞標準語。羅馬尼亞格拉烏爾院士指出：作家為了要創造地方色彩，通常使用很少的一些區域性的特點就夠了。

在地方戲和語言規範化的問題上，代表們有兩種不同的看法：馬彥祥說：政府對於地方戲曲

主張“百花齊放”，提倡地方戲自由發展。現在全國的地方戲曲有二百種之多。地方戲曲的種類如此繁多，主要是由於方言分歧的關係。推行普通話以後，地方戲曲的腔調和音樂將要變得一致了，這個矛盾應該怎麼解決？侯寶林說：現在地方戲的語言已經包含着普通話的成分。例如：山東琴書就有人用北京音來唱；蘇州彈詞的道白中也有一部分京白。這樣反而受到更多聽眾的歡迎。

在分組討論和大會發言中，大家一致認為這次會議的召開是及時的，會議是成功的。在學術討論上主要對下列兩點有了明確的認識。

（一）現代漢語規範化的意義

會議認為：為了充分地發揮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交際作用，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更加順利地進行，為了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為了給漢語拼音文字的實施準備條件，以及為了有效地發展民族間和國際間的聯系和團結，都必須使漢民族共同語即普通話的規範進一步地明確起來。關於規範化的標準問題，會議認為：普通話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這是符合漢語的實際情況和歷史發展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原則的。規範化並不是限制語言的發展，而是根據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把語言在其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一些分歧適當地加以整理，引導它向更加完善的方向發展。

（二）怎樣完成現代漢語規範化的任務

（1）要進行廣泛深入的科學研究。——會議認為：只有進行廣泛深入的科學研究，才能把規範化的工作做好。確定普通話的語音規範是目前首要的工作，必須迅速進行研究，使普通話的使用有更正確的依據。方言調查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語言學理論的研究和漢語史的研究對於規範化的工作有指導作用，應該予以充分的注意。語言教學必須放在科學的基礎上，也需要進行研究。

（2）發掘潛在力量，培養新生力量，加強團結和合作。——會議認為：由於中國語言學基礎較差，現在面臨艱鉅的任務，必須發掘潛在的力量，培養新生的力量，加強團結，有計劃地分工合作，並且要獲得各界人士的支持，一致為早日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奮鬥。

这次會議的分組討論和大会發言中都接觸到許多比較專門的問題，例如，標準音的詳細規範問題，詞彙和語法規範化的具體做法問題，書面語和口語是否要有分別的問題以及幾位外賓在規範化問題上所提供的理論介紹，由於時間的限制，都沒有能够深入討論。

會議對今後在規範化方面應該做的具體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議，將由領導方面考慮通過後施行。會議秘書處收到了60位代表以及同代表有聯系的語言工作者所認定的80個研究題目，其中語音和方言調查佔39個，擬調查17個省裏33個方言點。這一事實充分地說明語言工作者通過

这次會議已經初步地組織起來，並且為以後進行全面的分工合作奠定下良好的基礎。

總的講來，这次會議的收穫是很大的，但是這些成就不過是漢語研究工作的好開端，現在對規範化問題有明確認識的人還是少數。只有作好規範化宣傳工作，語言科學研究的組織工作才能為規範化工作的進行創造良好的條件。全國語言工作者應該迅速地建立健全的組織和計劃，彼此交流研究情況和研究資料，並充分發揮語文刊物的組織作用，發表研究結果，報道語言工作的情况。

〔齊力〕

全國水土保持工作會議

農業部、林業部、水利部和中國科學院在今年10月10日到10月18日聯合召開了全國水土保持工作會議。參加这次會議的有中央農、林、水利和科學研究部門及地方的代表共180人。水利部長傅作義、林業部長梁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和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都在會上作了報告。各地區代表分別介紹了不同地區水土保持工作的典型經驗。會議還就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意義、不同地區的不同措施原則、今後的方針任務以及與水土保持有關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

參加會議的代表一致認為，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即將到來的時候，召開这次會議是及時的、必要的。經過會議上的報告和討論，進一步認識了水土保持是一項羣眾性的改造自然的工作，是提高山區人民生產和生活水平，改變山區面貌和減免平原水澇災害的有效措施，也是根治河流水害開發河流水利的基本方法，因此，水土保持將成為農業合作化的主要工作內容，是整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後方針應該是：在統一規劃綜合開發的原則下，緊密結合作業化運動，充分發動羣眾，加強科學研究和技術指導，因地制宜大力蓄水保土，努力增產糧食，全面地發展農、林、牧業生產，最大限度地合理利

用水土資源，以實現建設山區、提高人民生活、根治河流水害和開發河流水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目的。

會議分析了全國各地水土流失的情況。據現有統計材料來看：黃河每年從黃土高原經過陝縣帶到下游和海口的泥沙平均達到13.8億噸，約折合9億2千萬公方，淤積抬高下游河床，造成週期性的洪水災害，威脅中下游城市、工礦和億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永定河上游水土流失也很嚴重，據官廳水庫觀測，1953—1954年共淤積泥沙達1億1,460萬噸，約折合8,115萬公方，如上游不進行水土保持工作，則二、三十年後水庫將失去其綜合利用的效能。長江流域的山區水土流失也相當嚴重，據歷年含沙量測驗，長江由松滋、太平、藕池、調弦四口進入洞庭湖的泥沙平均每年約1億4,000萬公方，入湖後隨即淤澱，使淤灘自北逐漸向東南湖中發展；又據湖南各水文站統計，湘、資、沅、澧四水僅1954年總輸沙量即達5,700多萬公方，流入並且淤積在四水下游和洞庭湖內，使河岸湖身日漸淤高，影響航運和長江洪水的宣洩。根據以上情況和黃河治理規劃的要求，會議認為目前應以黃河、永定河流域為重點，結合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帶動廣大羣眾大規模推行水土保持工作。同時，